

发人深思的 案例

「澳门客商」落网记

被色狼引诱的少妇

血和泪的呼唤

权与法的较量

一个家庭的嬗变

苦果三人尝

他被赌场吞噬

她为什么杀人？

发人深思的案例



江苏人民出版社

发人深思的案例

本社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1 字数 117,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7,000 册

书号：10100·863 定价：0.80 元

责任编辑 汪振华 许尔兵

目 录

- 权与法的较量 邢秀玲 (1)
一个留日女大学生的堕落 许斌 郭坚 (31)
悲愤的怒火 苏法 (54)
在“企业家”的招牌下 余瑛瑞 (88)
女经理的贪欲 石凡 (153)
“澳门客商”落网记 达文 (82)
金钱梦 苏法 (114)
血和泪的呼唤 蔺诩 (41)
漩涡 宁法 (105)
录在磁带上的控诉 建文 (49)
贪财恨 魏过 (163)
被拐骗的遭遇 吉晓东 (149)
犯罪的检察官 凡夫 (98)
可恨的“第三者” 云峰 (120)
一个青年“万元户”的堕落 罗庆朴 郎庆溪 (112)
一个研究生的自我毁灭 赵忆宁 (94)
她为什么杀人? 蔺诩 (161)
轻信的教训 吴君 (52)
少女的沉沦 宁士 (45)
利斧下的冤魂 王安云 (74)
少女的忏悔 自欣 (80)
走向“地狱”的路 林原 (116)

惨案是怎样发生的	贺强兴	(67)
封建枷锁下的血案	梁海香	(131)
“保险箱”里的蜕变	刑万生	(134)
“自我”编织的绞索	徐江善	(165)
她从死神身边回来	储玉	(19)
“何部长”上任之前	司波祖靖	(142)
假新娘出丑记	陈柯	(146)
一个家庭的“癌”变	范成珊	许大雷(26)
她从“地狱”中走出	贺强兴	(126)
迷信酿悲剧	刘启成	(129)
一个少女的“作家”梦	白春庆	(108)
“文凭”的骗局	艾湘涛	蒋益祥(139)
赌徒的自述	苏记	(156)
他被赌场吞噬	文华	(158)
女影迷的“才华”	吴明	(137)
该上法庭的罪犯	法如冰	(101)
不仅仅是无情	樊晨	(56)
罪恶的“爱”	王长水	(61)
一个失足女青年的经历	李欣花	王爱敏(69)
被色狼引诱的少妇	金频	(63)
虐待狂的下场	岳峻	(65)
新婚以后	毕耕	(92)
恶梦	悟果	郑毅(12)
从邮路到歧路	苏法	(160)
猜疑者的悲剧	苏仪	(119)
苦果三人尝	辛城	(169)

权与法的较量

邢秀玲

在青海高原，一桩六年前的普通杀人案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多少人打抱不平！多少人拭目以待！多少人大声疾呼！

六年了，时间的流水并未冲刷掉刀刻斧凿般的记忆。人民心头的阴影越积越厚，疑虑越来越多；由等待带来的失望，由失望引起的愤懑，青海人民怒不可遏了！人们纷纷质问：“青海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一个厅级干部的儿子故意杀了人，就可以不判死罪？”“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的六次批示在青海执行不了？”“国法何在？公理何在？”……

终于，体察民情的党中央发现了这一重大错判案，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做了批示，政法部门特派工作组来青海，重新处理这一案件。青海人民无不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欢呼真理的胜利！法律的胜利！正义的胜利！

古 城 的 笑 容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日上午，艳阳高照，景明晴和。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火车站广场召开了公判大会。从广场到刑场的十余公里的街道两侧都站满了人，市区总人口五十多万人的西宁，近十多万市民涌向街头，观看故意杀人犯杨小民经过重审，终于被依法判处死刑的情景。

会上，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讲了话。他指出：杨小民故意杀人案，是一起重罪轻判、长期得不到纠正的重大特殊案件。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给党的形象和国家法律的尊严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对此，省法院负有直接责任，省委和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会上，还表扬了秉公执法，坚持原则的四个单位和十一位同志。

当押解故意杀人犯杨小民的刑车途经市区中心时，人群中燃放了鞭炮，掌声四起，有人还不断高喊法制胜利的口号。

在大十字街邮电局门口，有人认出了受害者王强的父母王水和王丽琴，纷纷围上来，向他俩“恭喜”。王水手中拿着一张写好的电报，还没敢发出去。当他真真切切地看清刑车上押的确实是杨小民时，才转身走进邮局，给中央发去了这份代表全家心意的致敬电：“杨小民已处决，人心大快，感谢中央的支持！……”

王强的姐姐王欢茹跟着刑车到了刑场。当一声枪响，凶手倒地后，王欢茹流泪了。不过，这次流的不是辛酸的泪，怨愤的泪，而是喜悦的泪水啊！她激动地对在场的新闻记者说：“我悬了六年的心总算放下了，我弟弟九泉之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你们为我们的冤情帮了忙，说了话，我们全家要送锦旗！”

王水一家，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在省司法厅、法院、检察院的宣传栏旁，专门贴上了“感谢党中央！感谢青海人民！”的标语。小小标语，寄托了受害者家属的绵绵情意。

一时，西宁古城的街头巷尾，杨小民六年后伏法一事成

为千万人的议论中心。

一桩事实清楚，罪证确凿的杀人案，为什么竟会错判达六年之久？又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这还得翻开尘封了的日历，从头说起。

阳 光 下 的 罪 恶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早晨九时许，在青海省委家属院东二楼，《青海日报》编辑项加下夜班后正在睡觉。忽然，他梦中觉得有人呼喊救命，睁开眼一细听，果然有人呼“救命”！

声音是从楼梯那边的屋子里传来的。那里住着原报社干部王水的两个儿子。开始，他还以为是兄弟俩在打架，可呼声是那末惨，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顾不得自己上夜班的疲惫，一骨碌翻起来，连外衣都来不及穿，就奔向传来呼救声的屋子。门由里面锁着，呼救声、搬动家具声响成一团。他急迫地敲着门。这时，又有两位邻居路过这里，三个人紧擂房门，房门终于从里面打开了，从门里爬出一个血淋淋的人来。他穿着球衣，身上、脸上、手上都是血，项加惊呼起来：“哎呀！不好！”定睛一看，正是王水的二儿子王强。再往屋内一看，只见站着一个陌生人。他身穿中长风雪大衣，手持一把藏刀，刀尖上还滴着血；这个手持凶器、满脸血迹的人，必是凶手无疑。项加对另外两位目击者说：“你们看好凶手，别让他跑了，我去叫人！”

他直奔西二楼王水夫妇的屋子。待吓坏了的王水老俩口踉踉跄跄地赶来时，王强已倒在门口的血泊之中。他见到母亲王丽琴，凄惨地说：“妈，我不行了，血快流完了哇！”

“小农，小农，伤着哪里了？”王丽琴大叫着王强的奶名，一把抱住了血肉模糊的爱子。

“妈，戳到心上了……”王强微弱地说。

“凶手你认得不？”妈妈又问。

“不……认……得……”王强已无力再说了。

“快！同志们，帮我找个车，救我儿一把！”王水和王丽琴失魂落魄地呼喊。

有人已到省委办公厅叫来了保卫科的人和汽车。当时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凶手的父亲杨国英也出现在楼梯口，他沮丧地说：“糟糕，怎么把人戳下了！”至此，围观者才知道凶手是谁家之子。

待用吉普车把王强送到医院时，凶手杨小民和他的母亲已乘小轿车来到医院，找人为杨小民包扎擦破的皮。

躺在手术室里的王强，已经气息奄奄，命在垂危。医生打开胸腔，发现左肺被捅穿两个洞，右肺被戳穿一个洞，一块肺已经掉了，无法缝合。又打开腹腔，发现肠子已多处断裂，肾脏亦已破损。全身共留下刀伤十四处，连眼睛里都流着血，真是惨绝人寰，目不忍睹。

手术进行了十个小时，终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王强于次日凌晨三时死去。

临死前，处在半昏迷状态中的王强为双亲留下了最后的遗言，并要他们为他报仇。而这些话和杨小民最初交代的情节基本一致。至此，才弄清了王强何以遭到杨小民杀害的原因，也弄清了屋内行凶戮杀的真实情况。

事情的起因简单琐屑得令人吃惊：二月二十六日早晨，王强到水房去倒洗脸水，适逢住在家属院平房的杨小民在打

水（平房的水管被冻坏）。杨小民无事生非地骂道：“你不长眼睛吗，怎么将水溅到我裤子上了？”王强回答：“这么大的水房，我怎会把水溅到你裤子上？”

退一步说，即使王强把水溅到杨小民裤子上，又有什么关系？他做梦也没想到，竟会招来流血身亡的祸殃。

翌日早晨八时许，王强身穿红球衣、长裤，去上厕所，又碰见杨小民挑水桶来打水，双方互相对视，并争执两句。杨小民发现屋内只有王强一人时，便挑空桶返回家中，戴上了白帽子，穿上了风雪大衣，戴了眼镜、口罩，手持五寸藏刀，闯入未锁门的王强屋中，反手锁上了门。躺在枕头上的王强还没看清来人是谁，就被尖利的藏刀当胸刺了一刀。顿时，鲜血染红了枕头，喷上了墙壁，未满十七岁的王强，惊恐万状，一面用拳头阻挡，一面起身拿起炉子上的火钳自卫。可是，他哪能敌得过比自己大九岁又手持尖刀的凶手呢？王强忍着剧疼，连呼“救命”！并向杨小民求饶。杨小民不但不停手，又向王强的胸部、腹部连连刺去，仿佛王强不是一个血肉之躯，而是供他乱戳乱刺的活靶子。可怜王强已倒在地上，他又向王强背部连刺数刀。听到外面敲门声，王强挣扎着向门口移动，杨小民抢上前去，将门闩抵住，不准开门。王强急了，向杨小民的手咬去，杨又乘机向王强腰部刺去。王强抓住刀子，凶手用力一拉，将王强的四个手指齐刷刷割断。王强拼尽全身的力气，才将房门打开。

屋内的这幕凶杀场面，可谓骇人听闻，凶残至极。如果杨小民还稍微有点人性的话，也不会残忍到把一个人活生生地戳死，何况他们之间，并无不共戴天之仇，何苦下这么大的毒手？这无非只有一个解释：这是当代一些纨绔子弟的本性，

仗势欺人惯了，以为老百姓的性命可以随便处置，溅点水，瞪一眼，就要以血作为代价。

感谢当时城中公安分局预审股的张维成和靳长河同志，他们在凶手刚被拘留，未来得及串供之时，机智地取得了第一份真实口供，这对以后的补充侦察起了重要作用。凶手承认经过了化装，并漫不经心地说：“我想扎他几刀，即使死了，别人也认不出我来！”

不久，凶手得知王强已死的真相，以为死无对证，就开始翻供。直至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重新公审杨小民的大会上，凶手还一口咬定，闯入别人家行凶是“自卫”，为了找到根据，还振振有词地诡辩。他诬赖王强先用火钳击昏了他的头，他才“左一刀，右一刀地乱戳起来”。审判长巧妙地问他：“你进王强家时，戴了白帽子吗？”凶手答：“戴着哩！”

经鉴定人当场出示鉴定结果：白帽子上既未见血迹，也未见断裂痕迹。谁先动手，不言而喻。态度蛮横的凶手只能以拒绝回答相对抗。

其实，这一切在六年前就很清楚，人证、物证俱在，王强临死前讲的凶杀情节又和凶手的交代基本一致，难度并不在案件本身。

案发后，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就认定杨小民犯有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罪大恶极，提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意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城中区法院的意见，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上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

谁料，堂堂的高级人民法院在这样一个明了不过的故意杀人案面前，竟表现了惊人的私心和糊涂，原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树芳、副院长郑仲良、刑庭副庭长孙文合等人，违背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否决了区、市两级人民法院的正确判决，执意改判为死缓（一九八二年杨犯又被改为无期徒刑）。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原省委在“审批”此案时，没有认真研究查问理由，就草率地批准了省法院改判的错误决定，铸成了这起重大错判案。

杨小民在光天化日之下故意杀人，竟保住了活命，而未成年的王强却死于非命，含冤九泉，这是多么地不公平啊！

正 义 的 呼 声

杨小民改判死缓的一纸判决书送到了王水夫妇手上，两位老人呆住了。明目张胆持刀杀人的凶手竟不能依法严惩，国法何在？难道儿子的血白流了吗？

王丽琴含着悲愤的泪，一次又一次地跑高级人民法院，想问问凶手“改判死缓”的原因。直到第十次，才找到了院长杨树芳。这位执法者竟以“起因是小事”、“有斗殴性质”、“王强表现不好”等理由进行搪塞。更可气的是，象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说：“你说你儿子被捕了二十一刀，其实只有十四刀。”

他那冷漠的态度激怒了王丽琴，她大声喊了起来：“十四刀还少吗？你干脆放了杨小民吧！”

而他的那些理由，哪一条能站住脚呢？

因小事杀人，只能说明凶手更为狠毒、残忍；一方持刀夺门而入，一方还躺在床上，毫无思想准备，哪有斗殴的可能；这些连三岁小孩也能懂得的道理，身为法院院长的杨树芳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至于王强“表现不好”一说，且不说对凶手的判刑毫无意义，而且是十足的捏造、诬陷。

王强的心灵和外表都可以说是美好的。他身高一米七，清

瘦而飘逸。浓而黑的两道剑眉，高高的鼻梁，棱角分明的嘴唇，一双机灵的大眼睛闪射出温顺、善良的光泽。他有点“生不逢辰”，从他刚记事起，就碰上了动乱的年月，看到的是关进“牛棚”的父亲凄戚的眼睛，听到的是批判“走资派”的呼号声。这一切，在王强的心灵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从小胆小、自卑，生性腼腆、少言寡语，不敢惹是生非，甚至受了别人的欺侮，也不敢回家说。一次，他和一位骑自行车的人相撞了，他站起来后，赶紧向人家道歉，其实对方并未撞倒。他就是这样宽厚忍让。后来，他在陕西农村的姑姑家生活了数年，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独立生活能力比较强，打扫卫生、缝缝补补的事基本上由他来干。就在被杀的前一天，他还给家里洗了两大盆衣服，做了一顿晚饭哩。他初中毕业后因身体不好在家待业，有时干点零工，以贴补家用，很懂得孝顺父母。“表现不好”，从何谈起？

心爱的儿子被凶手捅了十四个血窟窿，还得背上黑锅。王强父母的心破碎了，眼泪流干了，母亲得了心绞痛，父亲的高血压更重了。他俩不仅要忍受失去儿子的痛苦，而且要承受告状无门，申诉无路的酸楚，真是伤心至极！万般无奈，王强的父母和二姐提出，在高级法院门前悬挂血衣，哭诉冤情，以期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

老实而木讷的王水，虽然是西北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但他查遍古今法律条文，也无法解释凶手杨小民改判死缓的原因。他是个本份守法的公民，一贯教育子女要相信党，相信共产党不会冤枉人。而今，面对冷酷的现实，他无言以对，只好同意妻子儿女的“出格”举动。

十二月份，青海高原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西宁古城中

心大十字街，紧挨着高级法院旁边，王丽琴和王欢茹挂起了血迹斑斑的血衣，声泪俱下地向过路人陈诉王强被残杀的冤情，控诉重罪轻判、草菅人命的错误做法。围观者静静地听着，女人们洒下了一掬同情的眼泪，男人们攥紧了愤怒的拳头。人群中，一位女军人气愤地说：“太不象话！旧社会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里的法院朝官开，有理无权莫进来！”

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们表示：“这种罪大恶极的凶手为啥不杀？你们上哪儿告，我们就跟到哪儿，跟你们评理去！”

还有的人建议搞募捐，哪怕每人募捐一分钱，每一分钱代表一颗心哪！

有人送来开水，让她们喝了再讲；有人端来凳子，要她们站上去讲，还有人做了饭送来。天晚了，人们自发地把母女俩送到公共汽车站（那时，他们已迁到马场），叮咛道：“你们对付的是当官的，要多加小心啦！”

挂血衣的第三天下午，群众自发地买来纸和笔，开始签名。不到两小时，签了数千名，以示对死者家属的声援和支持，要他们带着上北京。连交通警察也被母女的冤情所打动，自发地维持了三天秩序。

司法战线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同志也支持他们上告，说：“有理走遍天下！”“冤有处伸，状有处告，共产党里自有‘包公’！”

冤屈能够压垮人，也能使弱者变得坚强起来。一九八〇年元月，连大峽也没出过的王丽琴，偕同女儿和儿子，带着申诉书、血衣等，上北京告状。

北京的冬天，比青海还要冷，但北京的人情温厚。不认

识路，自有人当向导；没有介绍信，凭着申诉书也能找到留宿之处。在他们来京第二天，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西北组的同志就接见了他们，倾听冤情后，很快给了书面答复，并和颜悦色地说：“你们在北京逛几天再回去，我们给青海发函，也许你们没到家，函就到了。”

北京的名胜古迹多如繁星，颐和园的湖光山色引人流连，但他们三人没有心思观赏和游玩，匆匆地赶回了西宁。拿着最高人民法院给的信，王丽琴又来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她把信郑重地交给一位不知名的同志，谁料人家不经意地扔到一边，冷冷地说：

“这种信，我们每天不知收到多少封哩！”

王丽琴听了他的话，仿佛被泼了一瓢凉水，从头直凉到脚。

四月中旬，王丽琴带着女儿王欢茹第二次上北京告状。这次，母女俩多待了一些日子，找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纪委、《人民日报》等单位。可结果，跟前次一样，回到西宁又毫无动静。

告状回来，王欢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回到家中时，屋子已被丈夫腾空，只给她留下一张床，一个箱子。这一迹象表明，那本来就不太牢固的感情链条快要断了。丈夫曾劝过妻子“胳膊别想扭过大腿”，王欢茹不听，执着地要为弟弟伸冤。丈夫就乘此跟她分了手。看上去娇小玲珑、眉清目秀的王欢茹，倒有一颗钢铁般坚强的心，她不畏强权，不怕各方面的压力，不仅毅然承受了家庭离异的苦涩，也凛然抵制了来自凶手家长的利诱。当杨国英放风自己要给王家一笔钱时，外柔内刚的王欢茹闯到他门上，义正词严地说：

“你就是用火车装来钞票，我都不要，我就要你儿子的头！”

为了赴京告状，化完了王水的两千元退休费，卖掉了两块表、一台录音机、一台收音机、一辆自行车，还弄得债台高筑。有时，他们也因遥遥无期的等待而灰心动摇过，但始终坚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朴素的真理，相信共产党的天下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一九八三年，黄静波同志刚到青海上任，王欢茹和母亲跪在他面前哭诉，黄省长连忙扶起她们，说：“你们有冤尽管找我，我是公仆，人民才是主人，为民作主是我的职责！”她们前后找过他四次，黄省长在百忙中总耐心接见她们。在一些重要会议上，黄静波一直坚持要重新复议杨小民杀人案。

在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上，王丽琴母女向代表们跪诉冤情，恳求他们为死者呼吁。代表们陪着落泪，义愤填膺。一九八一年人代会选举时，许多代表以拒绝投票表示抗议：

“为啥去年的冤案还没解决？这样重大的冤案不解决，我们不投票！”表现了人民代表坚持正义的立场！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四年两次重大案件的讨论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群众要求判处杨死刑。八四年整党工作一开始，省级机关许多党员和群众，要求省委将纠正杨案错判作为整党的突破口。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党的耳目喉舌的许多新闻单位，反映了杨案的真实情况和被害人家属的控诉，表现了新闻记者敢于坚持真理的品格，正如王水一家最近赠送给一家报社的锦旗中所说的，他们“不畏权势，仗义执言”。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人心之所向，民意之所归。

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在王水一家四处上告，人民群众愤然不平的时候，改判杨小民杀人案的一些有关人员却官运亨通。凶手父亲杨国英两次提职，三次提级，已升到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地位。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人，还主管过办公厅的整党工作哩！

六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多次下达批示，省高级人民法院顶着不办，原省委对此案的复议一推二拖，对群众正义的呼声不听不问，这是为什么？难道执法者可以不依法办事吗？是谁给他们这种权利？难道党纪国法对他们不适用了吗？现在有关领导部门正在查个水落石出。人们正瞪大双眼在期待着。

（选自《民主与法制》）

恶 梦

惜 果 郑 毅

一列从银川开来的列车徐徐驶进了北京站。

月台上，一位早就在焦急期盼的姑娘，正透过泪水模糊的双眼望着这进站的火车。四年了，它每年一度地为她带来团聚的欢乐，也每年一度地为她留下别离的痛苦。今天，它真地把她盼望已久的幸福永远地带给她了吗？

列车喘息着停下了。呵，他来了，拎着大包、小包，兴冲冲地穿过人流走来，她迎上前去——幻想中的一切都将随